

新中国十七年外国问题研究期刊的创设及当下启示

赵少峰, 吕浩然

(聊城大学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 新中国十七年, 为适应国际形势与国家建设需要, 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相继创设了外国问题研究机构。在此背景下, 作为刊载外国问题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应运而生。在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的条件下, 这些期刊筚路蓝缕, 积极开展工作: 系统译介国外前沿学术成果, 密切追踪全球动态, 刊发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此类期刊创设与发展不仅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学术空白, 奠定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文献基础, 更显著推动了世界史、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知识积累与学术体系构建。作为新中国自主探索学科发展体系的关键实践, 早期外国问题研究专业期刊的创办极大地拓展了国人对世界的认知视野, 有力支撑了国家战略需求, 为后续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化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开拓之功在中国学术发展史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区域国别学作为新设立的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期刊是刊发传播前沿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 要在原创性概念、基础研究和海外一手资料运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上下功夫。

关键词: 新中国; 专业期刊; 世界史; 区域国别学

中图分类号: C01,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 (2026) 02-0117-11

收稿日期: 2026-01-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24VHQ013): 完善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海洋布局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 赵少峰(1982-), 男, 山东莘县人,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历史学博士;

吕浩然(1994-), 男, 山东济宁人,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6.02.013

外国问题研究专业期刊是以特定国家、地区或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等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能够发表具有学术性、理论性、政策性和前瞻性的研究成果的定期连续出版物。它涵盖了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和专题研究, 主要是为了推动对世界各地多元问题的深入理解。19世纪中叶以后, 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 近代中国读书人逐步加深了对域外世界的认知探索。同时, 西方来华传教士为改变中国人对域外世界“蛮夷”的传统看法, 他们在华率先以创办报刊的方式向国人系统介绍并传播世界各国史地知识。例如, 郭实腊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登了大量介绍西方文明的文章, 成为近代前期中国人了解世界信息的一个窗口。^① 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长达25年, 出版《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② 外国传教士创设的报刊拓展了近代中国学人对域外世界的认知, 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阅读西学著作, 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 逐渐摒弃了朝贡体系下的傲慢偏见, 开启了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西史东渐过程中所办的各种报纸、期刊是后来史学期刊之创办的先导”^③, 报刊的出现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 改变了人们对时局看法, 为日后创设专业期刊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上半叶, 有关域外世界的专业期刊已经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如1902年《翻译世界》正式创刊; 1934年, 胡愈之等人发起创办的《世界知识》; 1938年创办的《时与潮》与《国际文化》; 1943年又出现了《西洋史研究》。与此同时, 国内出现了《南洋学报》《南洋旬刊》《南洋情报》《南洋研究》等专门讨论东南亚问题的刊物。^④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外国问题研究专业期刊, 讨论焦点集中于

①赵少峰:《媒介的力量:近代出版机构与西方史学传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35页。

②于沛:《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52页。

③赵少峰:《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1840—1927)》,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3页。

④张小欣:《新中国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创设与变迁(1949—1984)——以厦、中、暨三校为中心》,《南洋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

欧洲和东南亚地区。此外,战乱频繁、政局动荡等造成中国学者难以集中精力去研究域外世界,更谈不上去创办外国问题期刊。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成为研究世界历史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史学由中国史学原来的一个流派,很快成为中国史学绝对的主流^①,中国史学界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贯彻于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中去^②,院系大调整后,全国高校普遍确立了世界史教研室。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校和科研院所陆续设立了世界史研究机构,专家学者讨论的焦点从苏联东欧地区扩大到亚非拉地区。外国问题研究的专业期刊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相继出现了研究苏联、拉丁美洲、非洲、中东问题的刊物,它们成为中国史学界与国际史学界交流的重要阵地,不仅向国人传播了世界史知识和最新的研究成果,还为中国外交工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新中国十七年外国问题研究专业期刊的创设,学界已有成果涉及此问题。^③ 本文将围绕新中国十七年相关专业期刊创设的缘由、发展特征及取得的成就展开论述,以此来窥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过程。

一、高校和科研院所创设外国问题研究期刊的缘由

新中国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占据了史学发展的主导地位。各大学历史学系普遍建立了世界史教研室、研究所,组建了相应的术业有专攻、分工较明确的教学与科研队伍。^④ 世界史专业师资力量的初步形成、世界史研究机构相继设立、国际问题研究青年人才的培养为专业期刊的创设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此时期关于外国问题研究专业期刊的创设原因可从以下三方面来认识。

其一,国家发展需要刊载世界动态的专业期刊提供支持。1951年,按照中共中央的工作安排,要关注国际时事动态,抓紧研究党内和社会各阶级对国内外时事的反应,组织和编审有关时事政策宣传的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出版物或其他宣传材料。^⑤ 1954年,新中国第一本专门的历史研究期刊《历史研究》创刊,每期都发表有世界史方向的研究论文,但发表的世界史方向的论文数量明显少于中国史。^⑥ 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1956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在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大会讲话时强调,建议研究所创办《国际问题研究》期刊,以发表该所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支持研究所接办《国际问题译丛》,以便及时发表国外有关的研究文章。^⑦ 赢得和平稳定的国内环境离不开妥善处理同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研究世界各国的最新成果需要有专门的期刊作为载体。与此同时,中国史学界需要同国际史学接轨,唯有掌握国外史学研究动态,才能更好地服务国家需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积极关注世界宗教问题。1963年,毛泽东指出:“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世界宗教方面的刊物。”^⑧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当时可供阅读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的杂志非常缺乏,随后国家将其中的部分宗教研究任务安排给了相关学者所在高校。

①于沛:《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0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

②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46页。

③喻小航、张强的《林志纯教授与世界上古史学科建设》(《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6期)谈到了1956年东北师范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等5所院校联合创设的《古代世界史通讯》;张小欣的《新中国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创设与变迁(1949—1984)——以厦、中、暨三校为中心》(《南洋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谈到了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创设的《南洋问题资料译丛》、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室创设的《东南亚研究所集刊》《东南亚月刊》;陈迎春的《建国初期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1949—1956年)》(《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谈到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创设发行的《国际问题研究》以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办的《国际展望·和平月刊》《世界知识》《时事手册》《外事研究》等其他期刊;任晓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史》(商务印书馆,2022年)谈到了国际关系研究所接办的《国际问题译丛》以及创设的《国际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创办的《国际问题资料》。

④孟广林、邹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河北学刊》2019年第5期。

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8页。

⑥卜宪群主编:《新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442页。

⑦《张闻天天年谱(1942—1976)》(下卷),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046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页。

其二,专业和学科发展需要专业期刊的支持。近代史学与古代史学一个显著的差别是,刊载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媒介发生了很大变化,让更多的学术成果走出了书斋,同时也让史学家的视野与社会发展需要逐渐结合起来。1963年,世界历史研究室的陈翰笙建议出版《外国历史资料》,不仅供本单位人员参阅,并寄送一些给从事研究世界历史教学和研究的院校,以分享国内外研究世界历史的信息。^①高校、科研院所不仅是从事科研工作的中心,也是普及世界史知识的教育重镇。创刊于1956年的《古代世界史通讯》是我国关于世界古代史研究的杂志。有学者记述道:“《古代世界史通讯》出版后得到广泛良好的反应,其中提供的史料和史学见解多为国内古史工作者所引用,真正起到了联系国内世界古代史研究力量和传送国内外本学科科研信息的作用。”^②拉丁美洲研究所各业务组合作开展基础研究工作,1962年开始编写并油印出版《拉美动态》。^③外国问题研究专业期刊是中国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发表成果的主要舆论阵地,为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世界史研究人员提供了学术交流平台,有助于各大高校研究学者开展世界史研究领域问题的研讨,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同时,在华的外国专家学者也通过专业期刊发表研究成果,参与学界相关问题的讨论,便利了中外学者学术交流。例如,东南亚研究学者D.威尔逊参与缅甸经济问题研究并发表《缅甸经济近貌》^④;日本学者和田久德参与东南亚华人华侨史的研讨并发表《宋代(960—1279年)东南亚的华侨社会》^⑤;H. C. 萨兹金参与东南亚经济问题的探讨并发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对东南亚各国的残酷剥削》^⑥;保加利亚文化部部长鲁·阿夫拉莫夫发表《保加利亚文化的发展》^⑦,被中国学者翻译。中外学者之间的研讨交流,促进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

其三,呈现最新的研究成果和世界发展态势需要专业期刊支撑。围绕国家外交需要和社会需求,高校、科研院所相继设立外国问题研究机构,从事研究的领域各具特色。为推进成果呈现,各机构设立了专业的期刊,或内部使用,或面向国内外发行。例如,拉丁美洲研究所(1961年设立)在建设初期为开展研究拉丁美洲各国战后发展的现状创办了《拉美情况》内部刊物,主要是反映拉美各国政治、经济、阶级关系、人民革命等重要题材的调研报告^⑧;西亚非洲研究所(1964年设立)扩大《亚非译丛》的内容,以关注中东、非洲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形势^⑨;河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室(1964年设立)主要从事日本经济和教育研究,后增设日本政治研究,为推动上述领域的工作,该所创办了《日本问题研究》,它是当时列入北京图书馆内部研究刊物目录中全国唯一的研究外国问题的刊物^⑩;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1965年设立)出版有季刊《东南亚研究资料》,此外还编印《东南亚动态简报》以加强对东南亚问题的研究^⑪。此外,复旦大学创办的《世界经济文汇》主要反映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态势、新格局。^⑫1956年至1965年,在中央号召和支持下,高校和科研院所陆续设立域外世界研究机构并开展对世界各国区域史、国别史的研究工作。各研究机构已经基本确定了主攻方向,但已有的报刊可供发表世界史领域的论文数量十分有限,不仅无法满足从事外国问题研究学者的普遍需求,也不利于高校和科研院所各研究学者之间进行学术讨论,更不利于同国际史学界进

①陈启能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史学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②喻小航、张强:《林志纯教授与世界上古史学科建设》,《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6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主编:《拉丁美洲研究所50年(1961—2011)》(征求意见稿),北京:拉丁美洲研究所,2011年,第18页。

④D. 威尔逊、美依:《缅甸经济近貌》,《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1959年第2期。

⑤和田久德、岳玉寺:《宋代(960—1279年)东南亚的华侨社会》,《东南亚研究资料》1962年第1期。

⑥H. C. 萨兹金:《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对东南亚各国的残酷剥削》,《东南亚研究资料》1963年第4期。

⑦鲁·阿夫拉莫夫、李庶:《保加利亚文化的发展》,《世界知识》1955年第9期。

⑧刘国平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国际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83页。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主编:《西亚非洲研究所40年(1961—2001)》(征求意见稿),北京:西亚非洲研究所,2001年,第11页。

⑩《河北大学史》编纂委员会编:《河北大学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90-391页。

⑪张晓辉、夏泉主编:《暨南大学史》(1906—2016),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1页。

⑫复旦大学校志编写组主编:《复旦大学志》(第二卷,1949—1988),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24页。

行密切的交流合作。创设更多外国问题期刊迫在眉睫。

二、外国问题研究期刊的特征

1950 年至 1966 年，高校和科研院所创设了一批外国问题专业期刊。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期创设的外国问题专业期刊有 36 本，具体情况详见表 1、2、3。

表 1 新中国十七年创设的外国问题研究期刊^①一览表

隶属单位	期刊名称	创设时间	备注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	保卫和平	1951 年	1955 年正式更名为《国际展望·和平月刊》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	国际展望·和平月刊	1955 年	由《保卫和平》期刊演变而来，主要介绍国外政治、经济、文化等
东北师范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等 5 所高校	古代世界史通讯	1956 年	由东北师范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等五所高校合办的专业刊物
复旦大学	世界经济文汇	1957 年	1959 年停刊，1983 年复刊
北京外国语大学	西方语文	1957 年	1959 年第 4 期更名《外语教学与研究》，1966 年停刊，1978 年 9 月复刊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南洋研究集刊	1958 年	出版 3 期，1960 年下半年停刊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室	东南亚研究所集刊	1958 年	1966 年停刊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室	东南亚月刊	1958 年	1966 年停刊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国际关系研究所	国际问题研究	1959 年	1960 年 7 月停办，1962 年 7 月复刊，1966 年 3 月再停，1981 年 7 月再复刊
中宣部、外交部	外事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	

外国问题专业期刊是发表外国问题研究论文进行学术讨论的重要平台，主要面向研究机构学术讨论人员，一些刊物如《保卫和平》《国际展望·和平月刊》《东南亚月刊》《国际问题研究》上的论文也会向大众群体公开。

表 2 新中国十七年创设的外国问题时事刊物^①一览表

隶属单位	期刊名称	创设时间	备注
中宣部、外交部	时事手册	1950 年	1965 年停刊，1980 年复刊并更名为《半月谈》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南洋动态资料	1958 年	出版 42 期，1960 年下半年停刊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拉丁美洲研究所	拉丁美洲动态	1962 年	1964 年底停刊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	外国史学动态	1964 年	出版 9 期后停刊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西亚非洲研究所	西亚非洲情况	1964 年	1966 年停刊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问题研究室	日本情况	1964 年	1980 年外国问题研究所成立后更名《外国问题研究》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拉丁美洲研究所	拉美情况	1965 年	1966 年停刊，1976 年复刊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东南亚动态简报	20 世纪 60 年代	

外国问题时事刊物主要刊载世界各国最新发展动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思想、文学艺术等各领域，一般给有关部门或研究机构专业人员提供重要的引用材料，唯有《时事手册》对外公开。

表 3 新中国十七年创设的外国问题内部资料刊物①一览表

隶属单位	期刊名称	创设时间	备注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译委员会	国际问题译丛	1952 年	1956 年国际关系研究所接办，1965 年停刊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室国际资料处《经济译丛》编辑部	经济译丛	1954 年	译介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上的文章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	国际问题资料	1955 年	1966 年停刊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	1957 年	出版 14 期，1960 年下半年停刊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②	1958 年	1966 年第 7 期开始停刊，1980 年 4 月复刊，2000 年更名《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研究室	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	1959 年	1960 年被《东南亚研究资料》替代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亚非研究所	亚非译丛	1959 年	1960 年停刊，1962 年 7 月复刊，1966 年停刊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国际关系研究所	国际问题资料	1959 年	内部发行学术资料，供专家学者参考，不对外公开发行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亚非研究所	亚非资料	1960 年	西亚非洲研究所成立后，1965 年该刊更名《西亚非洲资料》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东南亚研究资料	1960 年	1967 年停刊，1979 年复刊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资料研究室	外国学术资料	1962 年	1966 年停刊，1978 年复刊并正式更名《国外社会科学》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拉丁美洲研究所	拉美各国参考资料	1962 年	1966 年 5 月停刊，1977 年 1 月复刊更名《拉美资料》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历史研究室	外国历史资料	1963 年	“不定期”刊物，由陈翰笙提议创设，为世界历史研究所内部刊物，1966 年后停刊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西亚非洲研究所	西亚非洲资料	1965 年	由《亚非资料》更名而来，1966 年停刊，1978 年复刊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西亚非洲研究所	西亚非洲参考资料	1965 年	1966 年停刊
河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室	日本问题研究	1965 年	初为内部资料，1987 年改为公开发行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日本问题资料	1966 年	仅出版 1 期，1966 年停刊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	世界经济资料	20 世纪 50 年代	世界经济研究所内部刊物，1966 年停刊，后恢复发行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

通过对上述外国问题期刊进行分析，发现它们具有以下五个特征。

一是为推进外国问题研究，先从翻译国外史料开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亚非研究所创办的

①外国问题内部资料刊物主要限于机构内部人员参考，用于学术研究或给予有关上级部门参阅，一般不对外公开。

②该刊物主要译介现代各资本主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现状与趋向、思潮与流派，为了解和研究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材料，仅限于内部人员参考。

《亚非译丛》搜集翻译了关于西亚非洲国家的报刊文章^①，拉丁美洲研究所创办的《拉美各国参考资料》主要是翻译英、俄、西班牙语书刊和报纸上有关拉美国家有参考价值文章。^②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创办的《南洋问题资料译丛》主要是译介各国刊载的有关东南亚问题的文章资料。^③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室创设的《经济译丛》主要译介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上的文章。^④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辑出版的《国际问题译丛》是当时国内唯一的翻译国外关于国际问题文章的刊物。^⑤ 研究区域史、国别史需要更多的外国史料文献支撑，高校和科研院所不仅订阅了世界各国的报刊，还通过外国问题期刊刊载国外学者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供国内学者参阅借鉴。伴随着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中央对世界各国和区域发展动态的了解越来越迫切，对域外世界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1964年，陈翰笙在世界历史学科座谈会上强调：“我们只有了解国际上的研究状况，才能更好地知道我们该研究什么，该如何研究。”^⑥

二是创设期刊集中关注域外世界时事动态。自古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往来关系密切。1955年，亚非会议的召开促进了新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交流。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创设的《南洋动态资料》主要是报道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动态，为外事和侨务工作提供参考资料，满足了时代发展需要。^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丁美洲各国陆续掀起了反帝斗争并相继取得独立，引起了新中国的格外关注，世界两大阵营的分化迫使国家调整对外政策，工作重心从苏联东欧国家转移到亚非拉国家，拉丁美洲区域研究成为当时迫切的任务，拉丁美洲研究所的设立开启了拉美研究工作新局面。拉丁美洲研究所创设的《拉丁美洲动态》主要向有关部门提供拉美地区及各国的重要动态和信息。^⑧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发生变化，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展开讨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设的《外国史学动态》以报道外国修正主义历史学动态为主，也报道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学的有关情况。^⑨ 同时，西方国家与中国外交关系的逐步改善有利于中国加强与西方史学界的交流，不仅关注苏联史学发展也要兼顾西方史学的发展动态。

三是创设刊载区域国别研究成果的专业刊物。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创设的《南洋研究集刊》是该所创办的关于东南亚研究成果的学术性刊物。^⑩ 暨南大学十分重视东南亚研究所的建设，主攻南洋问题研究，创设《东南亚研究资料》。^⑪ 同样，《国际问题研究》也在此背景下产生。萧扬重视专业期刊建设，他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所出版《国际问题研究》用以发表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⑫ 专业研究机构与专业期刊形成了良性互动。研究机构汇集了优秀的世界史、国际政治、经济学等领域专业师资力量。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设以华人华侨史、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作为研究重点；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以南亚次大陆（印度、巴基斯坦）、中南半岛（泰国、缅甸等国）、东南亚经济地理及文化教育作为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研究所围绕着国际法、西方国家经济问题、亚洲国家问题开展综合性研究。各研究机构创设专业期刊，一方面促进了外国问题研究人员开展学术交流，密切了全国各地学者合作，传递了国际史学界最新动态；另一方面深化了中国的世界区域史、国别史研究，推动了世界史学科、国际问题研究建设。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主编：《西亚非洲研究所40年（1961—2001）》（征求意见稿），北京：西亚非洲研究所，2001年，第11页。

② 刘国平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国际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82页。

③ 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主编：《厦大校史资料（1949—1966）》（第三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26页。

④ 刘国平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国际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78页。

⑤ 任晓：《中国国际关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25页。

⑥ 陈启能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史学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⑦ 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主编：《厦大校史资料（1949—1966）》（第三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26页。

⑧ 刘国平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国际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83页。

⑨ 王学典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05页。

⑩ 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主编：《厦大校史资料（1949—1966）》（第三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26页。

⑪ 张晓辉、夏泉主编：《暨南大学史（1906—2016）》，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1页。

⑫ 萧扬：《张闻天与中国外交》，上海：学林出版社，2012年，第196页。

四是从世界经济史到世界经济问题研究,关注外国经济研究成果,服务国内经济建设需要。新中国成立后相继经历了国民经济的复苏、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经济发展是首要任务,新中国需要吸收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建设成果,了解世界各地经济发展动态,获取更多经济资料。《世界经济资料》是当时全国研究和探讨世界经济问题为数不多的内部刊物之一^①;《世界经济文汇》刊发了世界各国经济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属于世界经济研究领域的理论学术刊物,亦是世界经济研究领域的全国核心期刊之一^②;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出版了《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③,专门从事东南亚各国经济史料的搜集。

五是外国问题期刊突显了学术研究学科交叉的属性。国际关系研究所设立了亚洲国家研究室、西方国家研究室、国际法研究室^④,同时结合研究方向创设了《国际问题研究》《国际问题译丛》两个刊物^⑤,为适应国际形势变化需要又增加了《国际问题资料》内部刊物;西亚非洲研究所设立西亚北非研究室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研究室^⑥并创设《西亚非洲资料》^⑦《西亚非洲情况》等刊物;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设立印度支那研究组、泰国缅甸研究组、南洋群岛研究组、东南亚经济和经济地理研究组、东南亚文化教育研究组、港澳问题研究组并创设《东南亚研究资料》《东南亚动态简报》等刊物^⑧;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设立了日本现状研究室和日本历史研究室并出版刊物《日本问题资料》^⑨。国际关系研究所创设的期刊注重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国际法理论等领域的研究,有利于推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西亚非洲研究所相关的期刊把中东、非洲地区作为研究工作的重点,科研团体分工明确,相互协作,提升了中国的中东问题研究并促进了非洲史学科的建设;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把全部研究力量集中于中南半岛国家及东南亚各国经济、地理、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研究,逐步向东南亚区域史、国别史、华人华侨史发展,为完善中国东南亚学科建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的学术刊物以日本侵华史、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现状作为刊登工作的重点,为《日本研究》期刊的创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促进了中国日本史学科的发展。这些早期刊物刊发的成果立足于服务国家需要,涉及世界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法律等多个领域研究,既为新中国发展道路探索提供了参照,也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学术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

三、外国问题研究期刊建设取得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高校和科研院所积极回应国家需求,设立了一批外国问题研究机构,集聚了一批研究人才,他们积极地投入到世界区域国别问题的研究工作中。专业期刊的陆续创设,成为研究人员相互探讨、互相交流的阵地。此时期外国问题期刊建设取得的成就可从以下三点来认识。

第一,刊载了中国学者在外国问题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学术研究与国家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中国科

①刘国平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国际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0页。

②复旦大学校志编写组主编:《复旦大学志》(第二卷,1949—1988),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24页。

③张振江:《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6期。

④《张闻天年谱(1942—1976)》(下卷),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034页。

⑤马超、张凤霞:《张闻天对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突出贡献及当代启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主编:《西亚非洲研究所40年(1961—2001)》(征求意见稿),北京:西亚非洲研究所,2001年,第34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主编:《西亚非洲研究所40年(1961—2001)》(征求意见稿),北京:西亚非洲研究所,2001年,第63页。

⑧张晓辉、夏泉主编:《暨南大学史(1906—2016)》,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1页。

⑨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主编:《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五十年志(1964—2014)》,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0—161页。

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亚非研究所创设的《亚非资料》刊登了周士琴的《伊朗的民族阵线》、刘蕴华的《土耳其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①；西亚非洲研究所创设的《西亚非洲资料》刊登了吴兆契的《日本对西亚非洲的经济扩张》、温亮的《苏修同阿联的关系》^②；国际关系研究所创设的《国际问题研究》刊载了杨重光的《美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化》^③、袁泰的《论美国法西斯化》^④；世界知识出版社接办的《世界知识》刊载了郭全有的《美国在南朝鲜的殖民体系》^⑤、梁纯夫的《联合国已成为美苏政治交易所》^⑥。这些研究成果供国家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参阅，成为外交活动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学术刊物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通过学习互鉴，推动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

第二，刊登了世界各国最新动态信息，满足了国内的发展需求。拉丁美洲研究所的《拉丁美洲动态》刊登了《美洲国家第八次外长会议和多米尼加政变情况》《巴西的军事叛乱和政局动向》等即时性成果^⑦，《拉美情况》刊载了《当前古巴农业集体化的若干情况》《拉丁美洲 1965 年政治形势》等时事论述^⑧；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创设的《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刊载了詠洲的《澳大利亚及其亚洲邻国》^⑨、四野宫三郎的《欧洲共同市场与亚洲经济的整体化问题》^⑩等论文、《东南亚研究资料》刊出了郑焕宇的《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东南亚的经济扩张》^⑪，依·斯蒂芬、潘穗的《文莱 1964 年的财政预算》等重要成果^⑫。中国的世界史、国际关系等学科是在学习苏联教育模式、院系大调整中逐步建立的，上述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学者日益开阔的国际视野，拓展了中国学者的研究内容，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体地位。

第三，向人民群众普及了世界史知识，服务了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全国范围的传播，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积极学习科学理论的热情，世界史教育的大众化普及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他们通过抗美援朝战争、外交外事工作的开展等重大活动逐渐提升了对域外世界的认识。陈迎春指出：“《时事手册》《外事研究》等杂志作为当时中宣部和外交部主管的大型理论刊物……它们起到了普及国际问题知识、宣传中国外交政策的作用，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的起步。”^⑬世界知识出版社接办《世界知识》刊物的主要任务是普及和增进关于国际问题的知识，推动关于国际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⑭与此同时，国家希望更多地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的最新动态以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相关机构创设的外国问题期刊因而成为当时广大群众关注国际时事发展的重要媒介。

尽管外国问题研究期刊建设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然而在发展中也有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主编：《西亚非洲研究所 40 年（1961—2001）》（征求意见稿），北京：西亚非洲研究所，2001 年，第 114 页、第 115 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主编：《西亚非洲研究所 40 年（1961—2001）》（征求意见稿），北京：西亚非洲研究所，2001 年，第 116 页、第 117 页。

③杨重光：《美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国际问题研究》1959 年第 4 期。

④袁泰：《论美国法西斯化》，《国际问题研究》1962 年第 3 期。

⑤郭全有：《美国在南朝鲜的殖民体系》，《世界知识》1964 年第 14 期。

⑥梁纯夫：《联合国已成为美苏政治交易所》，《世界知识》1965 年第 24 期。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主编：《拉丁美洲研究所 40 年（1961—2001）》，北京：拉丁美洲研究所，2001 年，第 159 页。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主编：《拉丁美洲研究所 50 年（1961—2011）》，北京：拉丁美洲研究所，2011 年，第 229 页。

⑨詠洲：《澳大利亚及其亚洲邻国》，《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1959 年第 3 期。

⑩四野宫三郎：《欧洲共同市场与亚洲经济的整体化问题》，《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1959 年第 4 期。

⑪郑焕宇：《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东南亚的经济扩张》，《东南亚研究资料》1963 年第 1 期。

⑫依·斯蒂芬、潘穗：《文莱 1964 年的财政预算》，《东南亚研究资料》1964 年第 2 期。

⑬陈迎春：《建国初期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1949—1956 年）》，《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 年第 3 期。

⑭《张闻天年谱（1942—1976）》（下卷），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 年，第 1048 页。

一是专业期刊创设的数量有限。中国的外国问题研究起步晚,基础薄弱。从晚清至新中国成立时,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国际问题研究成果并不多,这就造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国际问题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学术期刊较少。”^①萧扬回忆说:“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中没有一种国际问题的学术刊物(只有一本普及型刊物《世界知识》),国际问题图书也出版得十分有限。”^②安春英指出:“这一时期国内学术刊物特别是公开出版的期刊很少。”^③20世纪50年代,中国处于现代化建设的探索时期,主要任务是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来,还顾不上仔细探索高校的学科设置和发展问题。世界史学科处在创榛辟莽的阶段,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师资力量并未达到数量可观的规模,高校世界史人才尤其是研究生的培养尚未形成正式的招生制度,此时期培养的世界史青年研究人才数量有限。此外,当时设立的外国问题研究机构仅有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室等几个研究中心。创设的期刊印刷后多是用于国家外交事务及专业研究人员学术交流,并非面向广大群众。尽管20世纪60年代国家设立的外国问题研究机构明显增多,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外国问题专业刊物,但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泛滥,中国史学界与国际史学界交流减少,中国学者因各种政治运动没有充足的精力投入到外国问题的研究中,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国问题期刊的发展。

二是专业期刊的研究成果受到苏联史学的影响。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张闻天指出:“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往往是抄袭苏联,人云亦云。”^④当时专业期刊刊载的研究成果“受苏联学者影响很大,往往唯他们马首是瞻,缺乏独立见解。”^⑤拉丁美洲研究所的陈芝芸回忆说:“俄文、英文书刊中有关墨西哥的资料也较多,如《墨西哥经济地理》《墨西哥国家制度》《墨西哥近现代史纲》等俄文书籍对了解墨西哥的基本情况十分重要。”^⑥20世纪50年代,中国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专家在中国高校讲授世界史课程,并帮助培养了一批世界史研究人才,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受到苏联史学的影响,中国史学界大批学者以饱满的热情收集并学习苏联世界史的最新研究成果。20世纪60年代,尽管中苏之间的分歧使中国学者对苏联史学产生了质疑,但是苏联的世界史著作、期刊论文依旧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世界史研究机构从事区域国别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三是专业期刊的发展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的《世界经济文汇》创刊于1957年,原为高等教育部批准的全国甲级刊物,1959年因故停刊^⑦;拉丁美洲研究所出版的《拉丁美洲动态》1962年1月试出版,1964年年底停刊,《拉美情况》1965年5月18日创刊,1966年5月28日停刊^⑧;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外国史学动态》(1964年1月创刊)刊行9期后停刊^⑨;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出版的《日本问题资料》1966年出版第1期,因文革而夭折^⑩。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挫折,各种政治运动的陆续开展使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被迫中断了世界史及外国问题研究工作,各种学术问题一度被束之高阁且无人问津,严重阻碍了学科建设。此外,一些即将刊登的重要研究成果因“左”倾思想的影响被付之一炬或遗失。正如萧扬所说:“新中国提出的‘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使国家更

①陈迎春:《建国初期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1949—1956年)》,《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②萧扬:《张闻天与中国外交》,上海:学林出版社,2012年,第189页。

③安春英:《学科突起与研究深化:中国的非洲国际关系研究70年》,《中国非洲学刊》2020年第2期。

④《张闻天年谱(1942—1976)》(下卷),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031页。

⑤马克垚:《70年砥砺前行的中国世界史学科》,《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⑥刘国平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国际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68页。

⑦复旦大学校志编写组主编:《复旦大学志》(第二卷,1949—1988),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24页。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主编:《拉丁美洲研究所50年(1961—2011)》,北京:拉丁美洲研究所,2011年,第31页。

⑨王学典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05页。

⑩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主编:《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五十年志(1964—2014)》,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1页。

加处于锁国状态,外国问题研究的发展几近停滞。在研究方向上,动向研究和基本情况研究之争终未停息。知识分子研究干部(包括某些右派)的使用,往往受到无端指责和干扰。”^①这就导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的外国问题研究完全中断,外国问题专业期刊被迫停刊。

四、当代启示

新中国十七年外国问题期刊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就。除了外国问题期刊外,其他的报纸中也刊载了一些学者撰写的外国问题研究论文。例如,蔡华同的《拉丁美洲的大庄园制和土地问题》(《文汇报》1963年5月)、邱醒国的《美国对中美洲人民的掠夺》(《光明日报》1963年3月)^②、胡有蓁的《北罗得西亚铜矿工人的罢工斗争》(《大公报》1963年4月25日)^③等,这些研究成果为当时人们了解世界各国时事动态提供了知识参考,让学界对国际社会复杂变化发展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备受国内大众的关注。然而,外国问题期刊主要任务是服务于外交活动需要和学术交流探讨,面向广大群众的知识普及尚未全面开展。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发生变化,中国史学界同国际史学界的交流受到影响。国内“左”倾错误思想泛滥引发的各种政治运动导致各学科发展遇到挫折,一些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受到批判被迫离开教学岗位,部分资料散失,大部分从事世界史、国际问题研究的机构与教学机构都被迫解散或者停止日常工作。^④直到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迎来了与西方大国的第三次建交高潮,高校和科研院所世界史、外国问题研究机构陆续恢复重建,外国问题研究期刊陆续复刊并得到新的发展。

当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回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需求,在服务国家战略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建设任重道远。系统性地推动区域国别学建设,离不开期刊的支撑和传播,我们需将期刊定位为集知识生产、学术共同体培育、政策沟通与国际对话于一体的核心平台,主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以机制培育原创性理论,开设“理论争鸣”“概念创新”专栏,鼓励基于非西方经验的原创性理论、标识性概念提炼;聚焦“全球南方”“跨区域联结”等前沿议题,推动从“描述现象”到“贡献范式”的跃升,逐步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二是要以栏目深耕一手田野资料,设立“田野笔记”“深度个案”等特色栏目,明确优先发表基于国外长期驻点、深度访谈与档案挖掘的实证研究成果;建立严格的资料审核与共享伦理规范,使期刊成为珍贵一手资料的“在地化”知识传播平台,强化学科的经验根基。三要以流程设计强制推动学科交叉,要逐渐打破学科壁垒,强化多学科攻关,策划“区域+气候”“历史+数字人文”“区域+安全”等交叉主题,引导研究者形成真正的问题导向而非学科导向的研究成果。四要以主动策划增强国际传播,设立多语种摘要与重要论文外译项目,主动参与全球对话;系统译介国外的重要成果,设立“全球视野”栏目,打破以欧美为中心的叙事垄断。五要以战略布局实现区域国别全覆盖,针对“一带一路”关键支点、大国竞争前沿区域及新兴力量、有特殊作用国家、国际组织等,系统组织刊发系列研究成果;逐步将期刊塑造成为连接学术前沿、政策需求与公众认知的枢纽,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坚实、多元、前瞻的知识支撑。

^①萧扬:《张闻天与中国外交》,上海:学林出版社,2012年,第203页。同样受影响的还有20世纪60年代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创办的《国际问题资料》,只出版了三期就停止了。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主编:《拉丁美洲研究所50年(1961—2011)》,北京:拉丁美洲研究所,2011年,第32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主编:《西亚非洲研究所40年(1961—2001)》(征求意见稿),北京:西亚非洲研究所,2001年,第114页。

^④赵为民、郭俊玲主编:《北大视野:新中国60年学术流变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1页。

The Establishment of Foreign Studies Journals in the Seventeen Founding Years of PRC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ZHAO Shao-feng, LV Hao-ran

(Research Center for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In the nascent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6),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academies established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e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evolving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Against this backdrop, specialized foreign studies academic journals emerged as core scholarly platforms. Operating under conditions of scarce resources and weak foundational support during their pioneering phase, these journals undertook arduous foundational work; they systematically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cutting-edg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losely tracked global developments, and published the scholarly works of domestic researchers. Their establishment and growth not only filled critical academic gaps domestically and laid the documentary groundwork for 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 in China, but also significantly propelled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nd disciplinary structuring in fields such as World Histo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As a crucial practice in New China's autonomous exploration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systems, these early foreign studies journals substantially broadened the Chinese populace'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provided robust support for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deepening and flourishing of China's 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 Their trailblazing contribution holds significant milestone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rocess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new discipline under the interdisciplinary category,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Area Studies serve as crucial platforms for publishing and disseminating cutting-edge research. They should focus on developing original concepts, integrating foundational research with first-hand overseas materials, and contributing to major national strategies.

Keyword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cademic journals; world history;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责任编辑 文刀]